

WINNER
of the
普利策传记奖
PULITZER
PRIZE

John F. Kennedy
PROFILES IN COURAGE

议员较量

美国前总统 约翰·F. 肯尼迪 亲述两院故事

[美] 约翰·F. 肯尼迪 著
刘珊珊 等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John F. Kennedy
PROFILES IN COURAGE

议员较量

美国前总统 约翰·F. 肯尼迪 亲述两院故事

[美] 约翰·F. 肯尼迪 著
刘珊珊 等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议员较量/(美)肯尼迪著;刘珊珊等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680-1125-9

I. ①议… II. ①肯… ②刘… III. ①政治人物-传记-美国-现代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9635 号

议员较量

(美)约翰·F.肯尼迪 著
刘珊珊 等译

策划编辑:胡佩榕

责任编辑:胡佩榕

封面设计:沈细乾

责任校对:刘晚成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155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翻 译 委 员 会

总策划 王 宇

总编辑 王 宇 杨 婷

翻译委员会成员(排名不分先后)

姜延峰 刘珊珊 刘盼盼 苏芳芳 叶俊海

刘 杰 梁 猛 陶 军 李莉莉 王劲松

陈红英 赵真真 赵亚飞 詹晓艳 杨丹丹

王孝琼 宋亚利

序言 从政者的勇气

这本书谈论的是最令人钦佩的美德——勇气。海明威将勇气定义为“重压之下的从容”。本书讲述了八位美国参议员的故事，他们承受重压却从容不迫。他们面临事业的风险、政策路线不受欢迎，遭受人格的污蔑以及名誉和原则的破坏，但他们凭借自身的勇气终于反败为胜——但这种情形实在不多。

勇气曾经在公共生活中格外受到推崇，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将它忘却，也不再强调或者褒赏民选领导人身上的这一特质。我们也许记得约翰·昆西·亚当斯利用亨利·克莱的政治计谋而登上了总统宝座，但恐怕早已忘了年轻时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了前途似锦的参议员生涯；我们也许还记得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执政期间，加强对国家银行的庇护，却忘了他在退出政坛之前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我们不记得这些，或许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很多年以前，曾经有位大报的专栏作家告诉他的数百万读

者，“人们一点也不在乎参议员或众议员说了些什么。不在乎的原因是，他们知道你在议会中听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废话、蠢话和充满煽动性的话，根本不可听信……”

更早的时候，还有某位内阁成员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参议院已经整体堕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参议员也并无诚信可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心智上愚钝，完全不适合担任参议员。有些更是粗俗的煽动者，……也有些是通过财力当上参议员的富人，……还有些参议员则是眼光短浅、领悟力有限的党同伐异分子。

而在这之前，一位参议员亲口告诫同僚：“因为我们毫无理由的拖延，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已经消失殆尽。”

整个参议院都明白现在的许多美国人普遍持有这种看法。我们经常听说，参议员必定是政客，而政客必定只关心投票，并且不具有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刚毅果敢的气魄。家长们内心里也许仍然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成为总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根据几年前的盖洛普调查，他们并不希望孩子为了这一目标而从政。

一系列的非议与贬低并不意味着参议员在堕落。以上面所举的三位政治家为例，一位身处 20 世纪，一位是 19 世纪，另一位是 18 世纪（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的是定都何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参议员不再拥有勇气这一美德呢？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细心观察后，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

新书中对政客和选民做出了严厉的评价：

无一例外，成功的民主党政客大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他们基本上都是靠息事宁人、绥靖、贿赂、煽动、哄骗来从事政治活动，要么就是对选民采取操纵或威胁的行为。他们考虑的并不是提案的好坏，而是会不会受到大众的欢迎；也不在乎提案能否带来长远的益处，而在乎选民会不会立即喜欢它，对它感兴趣。

成为“成功的民主党政客”近十年的我敢毫不犹豫地说，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懦弱之辈。我坚信，虽然复杂的公共事业以及对公众注意力的争夺，已经使无数具有政治勇气的事情消失不见，但是这些英勇事迹实际上在参议院也是屡见不鲜的。我坚信，相对于参议员的今不如昔，其实公众在对政治艺术、对妥协与平衡的必要性、对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院等的理解上是更加的今不如昔。最后我坚信，我们批评那些跟风，没有自己主见的人，同时也批评那些不为外界所动的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理解参议员对他的选民的责任，也或者是无法直面政途中的困难，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政治良心。用韦伯斯特的话说，犹如“乘着一叶小舟独自离岸，进入那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正是这些大得令人窒息的压力，让参议员放弃了自己的良心，但是如果美国国民能够对其充分理解，也许不仅不会去责备那些选择坦途的从政者，反而还会为他们的勇气喝彩。

这里要提到的第一种压力，是几乎不被公众发觉的压力。

美国人希望被他人喜欢,参议员当然也不例外。人类在本性上是社会动物,我们享受同志情谊以及来自朋友和同事的赞许;我们喜欢受到他人的赞扬和欢迎,讨厌被人诋毁或冷落。我们希望顺从良心,但另辟蹊径的行为方式又会使我们感到孤单,所以我们才更迫切地希望能与参议员和党内其他同仁们搞好关系,遵守规则,不搞标新立异,以免造成其他成员尴尬。其实我们大家在参议院里的影响力以及怎样能实现自己和选民的目标,绝大部分依赖于其他参议员对我们的尊重程度。在我进入国会时就被告知:“相处融洽之道,在于结伴而行。”

“结伴而行”不仅仅意味着拥有良好的关系,还包括妥协。我们不能随意地将所有的妥协都贬低为低劣的品行,因为政治和立法的处理并不是不可变的原则或是遥不可及的理想。正如约翰·莫莱描述的那样,“政治是某行为在某时间段的最佳选择,作选择的关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生活的民主方式以及政府的联邦体系,决定了立法需要在多种个人和团体意愿之间达成妥协。亨利·克莱说,妥协是将整个国家黏合起来的“黏合剂”:

所有的立法都建立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之上。那些将自身高高置于人性之上,置于人性的缺点之上,置于人性的软弱之上的人们会说“我可从不妥协”。但是对于意识到人性弱点的我们来说,妥协是不可轻视的。

妥协避免了两派改革者——绝对禁酒派与绝对开放派、世

界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反活体解剖实验者与支持活体解剖实验者,这样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会将整个社会撕裂。盲信者、极端者,甚至是那些坚持信奉原则的投票者,他们常常对他们的政府没能快速实施其全部的施政纲领感到失望。但是立法者却有着安抚州内和党内反对力量的责任,并且在联邦层面上能够在更大利益博弈中代表这些力量。而且立法者深知,每一个提案要使所有的真理和公义都站在一方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我的不少同仁,如今被批评为丧失原则,或者被指为妥协的政客,只因为他们投身于解读各种公共观点以及调解和平衡各个派别这一高难度艺术。其实这种艺术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政府的良好运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良知也许会不时地激励他们应该采取更为严厉的立场,但是理智却告诉他们不完美的提案毕竟好过没有提案,只有通过互相的妥协,提案才能得到参议院、众议院、总统乃至全国人民的认可接受。

但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妥协以及向谁妥协。因为很容易陷入不必要的让步,让“结伴而行”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非解决立法冲突的方法。

“结伴而行”还有更深层次的认知,也就是说只要跟随我所选择的党的领导人,我就会得到应有的奖励。国会所有的成员都充分意识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即使借党内团结之名来实施罪恶的行为,但如果不服从指挥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给我们的政党带来恶果。而且,在从政的这些日子里,立法者所能获得的赞

助金额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盲目地打破党内等级将会使他的赞助金额马上变为零。甚至他感兴趣的立法之所以能够成功通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得益于因他对政党的各种支持而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党内领导人的协助。最后,因良知驱使走上了孤单道路的参议员很可能会发现,他遭到的非议不仅来自参议院内的同僚,也来自对他的竞选事业而言非常重要的政治捐款者。

一般有利知的参议员所面临的第二重压力是能够在下一次竞选中再度当选。我们不能将这个视为完全自私的目标,虽然选择政治作为职业的人应该致力于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为了维护某一原则而跌倒的参议员,是没有机会在未来赤手空拳为这一原则或其他原则而战的。

并且,竞选失败不仅是参议员个人的失败,也是对支持自己的政党,甘愿为自己冒风险或贡献积蓄的朋友和支持者以及妻子儿女的一种打击。妻子儿女的快乐与安全是无比重要的,而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仕途的成功。

在一个非专制国家,只有投身政界才有可能使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包括他的职业生涯在内的全部所得。在私人生活中,比如生意领域,我们希望个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培养自己的个人兴趣,以获取全方位的进步。但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却要求从政人士因公忘私地促进国家利益。

除了从政者,没有哪个职业的从业者会因为某个议题而葬送自己的荣誉、威望和事业。律师、生意人、教师或医生,他们也

会面对事关道德而作出困难决定,但是基本上不会像从政者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对它们,至少不会像参议员面对一场重要投票那样,直面令人敬畏的最终决定。参议员也许希望能够有再多一点的时间来做决定,也许相信双方会有更多一些的情况去了解,也许感觉某一个小小修改可以解决所有的困难,但是当投票开始的时候,他便无处可躲,既不能蒙混过关,也不能拖延时间。那种感觉就像是他的选民们如同爱伦·坡《乌鸦》这首诗中的大乌鸦一样,坐在自己参议员的桌上,在给他投出事关政治前程一票的时候,嘴里还哇哇地叫着“永不复还”。

几乎没有参议员主动地选择解甲归田。华盛顿无处不在的“波托马克热”病毒(比喻获得高官的欲望)在参议院流传最为广泛。从“世界上最难进的俱乐部”被迫退休,放弃参议员专属的有意义的工作、显赫的职位以及特权,就算是最有勇气的政治家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严重失眠。因此,有一些参议员还没有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选择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道路,来调和与大多数选民在立场之间的冲突。这些参议员并不是政治上的懦夫,他们仅仅是习惯了与大众的意见达成一致。

还有一些参议员,他们虽然良心未泯,却也无可奈何地感到,若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将良知搁置一边。他们赞同政治作家弗兰克·肯特的观点,选择政治这一职业并非不道德,而是无关道德:

也许对于具有政治抱负的政治者来说,最高的成就在于“说

一套做一套”，……但更重要的并不是站在议题的正确立场一边，而是站在流行立场的一边，……所以无论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只要确保得票率，有关对错的道德就没必要考虑。

肯特引用的如下一段话，是亚利桑那州前参议员亚司特在1920年选举中给同僚马克·史密斯的建议：

马克，你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你拒绝成为一名妥协者，你不会因为想要当选而把自己的原则隐藏起来。你一定要知道，在公共生活里面，有些时候人是不得不委屈个人原则的。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再一次当选的愿望是衡量独立勇气的标准。

打消有良知的众议员或参议员(这里所叙述的问题完全适用于参众两院)道德勇气的第三种压力，也是最重要的压力来源于利益团体、有组织的来信者、本人的选区、金融财团甚至普通选民。对这些压力的处理方式，是违背他们还是取悦他们，都是一项让人生畏的任务。有时我们会效仿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格罗蒂的做法。1934年他曾写信给一位选民：

我不得不收到无数像你这样的蠢货寄来的胡言乱语的信件是身处国会的无数弊端之一。在信里，你说我曾承诺在马德雷山重新造林，说我现在已经进入众议院两个月了，却还没有兑现承诺。你干脆做两个跑步起跳，直接跳到地狱里算了。

幸运的是，也可以说不幸的是，基本没有议员会这么做，但是赤裸裸的挑衅在那儿，不仅来自满纸荒唐言的来信，也来自各

种永远不满意的埋怨和朝令夕改的要求。

比如今天我在办公室,接待了一行来自于新英格兰纺织行业的代表团。纺织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他们希望能降低来自澳大利亚羊毛的进口关税,同时又希望能够提高来自英国羊毛成品的进口关税,因为他们必须与后者竞争。

一位来自南方某州的参议员告诉我,不久前一个带着类似诉求的代表团拜访了他,而且敦促他进一步采取措施:一是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以保证他们在高工资状况下获取更多的利润空间,但这让我的选民万分沮丧;二是结束与日本的低工资竞争。

仅昨天就有两个团体将我从参议院叫出来。第一个团体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他们很担心自己的职位被裁撤;另一个团体是生意人团体,他们认为当地政府的某一做法不利于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因此要求当地政府停止此做法。

所有参议员每天都在面对无数这种相互冲突的诉求和请托,这些诉求和请托反映出来的各种纠纷在我们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诚实地告诉选民们,我们对此束手无策,选民们便会认为我们能力低下、毫无同情心。如果我们按照选民们的想法去做,最后无果而终,结果就是被代表其他选民利益的其他参议员们抵制,最后我们的选民们就会说,我们和其他政客并无差别。我们能做的,就是灰溜溜地回到国会休息室里,靠在深表同情的同事肩膀上哭泣,或者是回到家向妻子发脾气。

也许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这些来信者和压力集团只能代表一小部分选民。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选民的观点,在我们和公众的联系人数中,他们占据了较大比例。我们不可能直接知道公众的观点,但是公众的选票我们必须争取,而且他们的观点也许只是与我们努力的方向略微不同,其他大部分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位退休后的参议员曾说过,他在每一个议题上的投票都希望代表大部分人的立场和特殊利益,这样大部分人便会带着感恩之情记住他,而剩余的小部分人则从不会,因为自己的投票违背了他们的福利。让人欣慰的是,这个看上去十拿九稳的如意算盘在这位参议员身上并没有奏效。

这三重压力降临在良心之士身上,他不可能忽略所属的政党、选民、利益集团、家庭的需要、同事的情谊、当选议员的功成名就感、妥协的必要性以及继续当选的重要性。他必须选择走哪一条道路,判断出哪一步会对自己为之献身的理想有帮助或者阻碍。他必须意识到,为了提高自己继续当选的几率,因为害怕影响前程而开始在一个又一个议题上牺牲了自己的原则,并且在未来不再为原则拍案而起时,这样的他便已失去了那份良知和自由。当初正是良知和自由使自己得到了选民信任而当选。但是,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会押上自己的前程,这是最棘手也最费心思的决定。

也许有人会说,只管做对的就好了,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不用考虑它是否为大家所接受,无视压力、诱惑以及错误的

妥协吧。

这个答案看似非常的简单,但是这只是对那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们而说的。因为这牵涉到的,不只是政治压力还有个人抱负。就算是我们可以或是期望“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对选民们的要求置若罔闻了吗?在上面已经提及,各种各样的权势、人情都会让政治勇气变得非常的困难。而在宪法上会提出一些更为理论性的义务,也就是对政党、对国家以及对选民们的义务,这些义务对道德勇气的正当性提出疑问。

有很多人都认为,参议员最重要的职责是能够代表他所在州的立场。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都有相对主权,在具体要求上面也不一样,所以对于参议员而言,宪法义务就是要代表本州的权益。有谁会替马萨诸塞州说话呢?要是本州的参议员们也不站在这一边的话,那么整个州的权利甚至是地位都会受到影响,在国会中平等的地位也会逐步丧失了。

参议员们只需要稍微留意一下,应该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同事们都是代表着他们各州的利益。如果因为国家的需要而必须放弃某些利益,那就应该让选民而并非是参议员来决定放弃的权利,包括放弃的程度。在由副总统担任的参议院议长的眼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或者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这些人都是当地选民的权益维护者,同时也是常驻华盛顿的选民代理人。

然而,这些也只不过是硬币的其中一面。因为在华盛顿,大

家都是“美国的参议员”，无论是从马萨诸塞州过来的参议员们，或者是从德克萨斯州过来的参议员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美国参议院的成员。大家任职时的监督人都是副总统，而不是各自代表州的州长。大家一同来到了华盛顿，用埃德蒙德·伯克说过的话来说就是，这并不是派出各州那些心怀不善的辩护人或是虎视眈眈的使节来反对其他地区的代表，而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同为国家的国会成员。当然，参议员们也不可以将自己地区的利益忽略掉，毕竟能有今天的地位都是拜当地选民所赐，所以地方利益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如果地方利益完全支配了参议员们的行为，那么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压制。

除了地区利益，还不能忽略了对政党的义务。来自政党的压力上文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就算参议员可以对这些压力熟视无睹，参议员也有义务与将其扶上现今这个地位的政党保持一致。我们这个国家一直坚信对政党尽责这一原则，大家都有意识一定要遵从政党平台发出来的声音。也只有如此，我们这个实行两党制的国家才会避免多党之间的掣肘。

但是，不能因为政党的责任压力而忽略个人责任。如果政党为了追求纪律、团结以及成功，而对一些新颖的观念和独特的见解排除放弃，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用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参议员的话来讲，就是：

只有经历成长的政党才会存活下来，不去包容各种观念只会走向灭亡……如果一个政党只是靠着选票来发展自己，子承

父位,那么这将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中国式的堂会;这里也不再是以良知和思考为基础集聚的公民,而是通过身份地位以及偏见组成的印度部落。

两党制之所以可以得以保留,原因不在于这两个党都固执己见,而是因为这两个党都非常具有张力。在我进入国会的时候,共和党有非常雄厚的力量,并且还拥有罗伯特·塔夫脱和韦恩·莫尔斯,而我所服务的民主党,正以哈里·伯德与韦恩·莫尔斯这两名实力大将为傲。

当然,如今这两个政党都在谋求为国家的利益而服务。两党之所以这样做,一个不太高尚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大量民众的支持。但是,当执政者与政党在如何实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将政党或者是选民的利益责任放在第一位,而应该去让自己的良知来回答。

一般而言,把地方利益以及政党义务弃置一边是比较容易的,而放下选民意志的责任却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些违背选民意志而行动的参议员们,是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这时的他就不再代表真正的选民意志了,他已经无法回报选民们对他的信任,他辜负了那些给他投票、给他希望,还有那些推崇他想法的选民们的托付。就像约翰·泰勒第一次在议员演讲中质问众议院,“被造之物是不是会把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相互对立起来?仆人会不会不去遵从主人的意愿?”

如果参议员说的只是自己的话语,而不是人民的话语,他怎